

远离文学和文本：对当代西方文论困境的一点反思

朱立元

【作者简介】朱立元，男，1945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本文根据朱立元先生2015年12月8日在吉林大学学术演讲整理而成。

我主要针对这些年来中国在九十年代以后，新世纪以来在引入西方文论中，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思潮进来我们学界以后，据说有一部分的是分析批评或者是反思的不够，就有盲目的全盘接受，这样相对比以前多了一点。当然实际上整体上来讲我个人的看法，因为跟学界有些老师看法可能不一样，我个人的看法是主流是好的。就是说引进的过程中，我们中国学界在新进的时候就有取舍、有选择、有批判、有反思。但是也存在我刚刚讲的好多问题在里面。拜倒在西方的，特别是当代文人的脚下，没有任何的批判。这样的就是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这个情况我个人的立场、基本上是既不赞同，因为这个观念也是有的，有一部分讽刺比较少的。

少数学者文章里都很明白的写着，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西方的东西几乎是全盘接受，完全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走。甚至有的时候不只，五四以来整个中国文人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这个我是不赞同的。我认为主流肯定是好的，而且有些好的已经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吸收进来。有些也是成了我们话语的组成部分。有些概念我们直接从古代照搬很困难，中国古代文人很好，但是照搬肯定是行不通的。有些西方的东西在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转进了我们中国的文人话语也是适用的，这就可以解释一些新的文学现象。这一部分我们不能说这是全盘西化，这已是中国化，也是中国化的过程。所以我认为这是主流。

但是另外一种，确实有一些人对西方的东西不加分析、盲目的赞颂，这个情况也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讲有一些我不知道同学们关注到这种现象没有，在新世纪以后，05年前后，中国当代讨论的一个话题也比较有影响，就是审美化。审美化以后，进一步推论就是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模糊了。广告语都可以写的比较美，就是说它也有远离审美。所以在强调文学的边界已经扩大，包容很多非文学的东西也进入了。那么文学边界的扩大，我们对文学的基本的理解也有了影响，比如文学以审美为主要跟非文学区别的语言的形态，好像不适合。所以他们提出来要有一个文化研究转向。有个学界的朋友，我后来在文章里都讨论过。我就觉得有一点跟着西方走，把西方的文化研究抬的很高。西方文化研究有很多很有成就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弊端。这就是我们的现状，针对发展过来，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一些情况，我个人的这篇主要是讲对西方文论当代文论发展，这篇和耶鲁学派和文化研究是有关系的对象。因为它有代表性，对西方当代文论出现的一些，简单来说就是远离文学，远离审美和语言，甚至远离文本。文本不看也可以写也可以去理论。这情况我觉得这是西方文学理论和西方的文化研究在当代的一个，他是最新的发展，但是这个最新发展他自己实际上已

经遇到了困境。

我想要反思的就是这个。我们不能看到西方的什么东西就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确实也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他发展到极点以后就变质了,变味了。我今天是针对这样一个状况做一点反思。但是我在这里面可能要做一些介绍,大家可能不会信。比较奇怪的一些现象也请大家谅解。我知道大家看过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这个书因为出来的时候还是比较早。我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跟他自己以前的说法有很大的变化。后来翻译进来,就在学界里面引起很大的讨论。那么我们中国的学界,就在这两三年内,就进入后理论时代。就是说因为理论之后嘛,他讲的就是文化理论,他讲的实际上就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这个理论已经不行了,已经走下坡路了。这个理论之后在西方,他自己成为理论之后。那么在中国,也就跟着反思这个问题,西方以后不知道我们是否也会失去了我们的方向。这个讨论的也很多,我今天因为重点反思它的危机,西方当代文论的危机和困境。就以这个理论之后作为今天讲课的一个开端吧,这个理论之后也就是标志着当代西方文论,出现了公认的危机。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那么伊格尔顿他一开始就说文化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他走下坡路的意思。他举了很多人,雅克·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巴尔特、福柯、威廉斯、伊瑞格里、布尔迪厄、克里斯蒂娃、德里达、詹姆逊和赛义德等等这些,这一长串人都是当代西方非常顶尖的最活跃的一些人,影响非常大的。这个伊格尔顿说他们开创新的,对他们当然不是批评了。他认为这些开创新的作者已经远离我们了。成为明日黄花。而后辈继承他们的人,未能拿出能与前辈比肩的观念。所以加快文化理论的衰落。定了这样一个调子,这个调子是比较悲观的,对西方当代文人来说,比较失望的。实际上这个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其实我主编的当代西方理论已经涉及到一部分,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并没有看到这个危机,总体上我认为他们还是在,实际上他特别是到后面开始衰落这一部分我们并没有关注这一点。我们一个是讲了曾经有过大好时光,主要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到八十年代走向繁荣。往后又延伸了几年到九十年代初,到了顶峰。那么这个时候伊格尔顿就想,我们文化理论确实是非同凡响的十五年。大约从1965年到1980年期间,他的时限都讲的很明确。他说这是二战以来文化理论异军突起的唯一时期。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崇拜作为社会营养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这是一个大转型的时期,变化很大,很剧烈的一个时代。那么他这个文化理论在这一段,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而且在那个时段逐渐走向高峰。那么这个文化理论,它其实在欧洲扩展到北美。而且不仅仅是文学方面,它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产生影响,也对这些方面都发生影响。当然啦,这也是促使它蓬勃发展的一个原因。他指出呢,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文化理论那里,愉悦欲望与艺术语言传媒躯体,就是身体,性别族群这些用一个词概括就是文化。所以我们以前讲的一些族群啊,性别啊,这些都是文化理论当中的一些关键词吧!这些就可以把它看成一些泛文化的思想。他说那个年代引人窒息又活跃时髦,有过对综合知识广告和商品至高无上权利的交易。对那个商业商品化这种情况焦虑,走到了最高峰的时候,盛极而衰。几年之后检验这些所有文化理论,自己也有成为另一种浮华商品的欲望。成为高价,倒卖自身符号资本的一种方式。让文化理论本身成为一种符号,成为一种资本。这个符号资本的理论,刚刚也讲到了,

蛮深刻的。当然,我刚刚念的都是理论之后的一些话。这其实就勾勒出了一个,在伊格尔顿心目中文化理论由盛到衰的一个历史轨迹。走过这段路的,其实他是从文学理论起步,后来发展扩大到文化理论,最后走向自己的衰落。这个过程,我觉得值得我们反思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代西方文本论的危机啊,他的征兆就是在过度泛滥西方文化理论的冲击下。文学研究和批评本身也日益萎缩衰退。就说人家的文学理论开始的文化是从这里开始,到后来他过度泛化以后,就是文学研究本身,批评本身也就萎缩了。那么,这实际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比如美国一个当代很著名的学者乔纳森·卡勒,他写过一本书《论结构》,是我们欧阳教授翻译的。他有两个方面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着文学研究。他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世界,来考察。文化研究是一个包容量极大的课题,他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又发现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包容里面,其实又发生了内在的矛盾。就是在大课题当中,文学研究能够获得新的动力和见解,还是文化研究吞没了文学研究并破坏了文学研究呢?这问题,其实提的蛮尖锐的。实际情况,就是像刚才伊格尔顿讲的,文化本身走向反面了。就是有文学研究起步,最后反而破坏了文学研究。那么这个情况,也是我今天讲的一个主题,就是他的危机,吞没了文学研究。那这个文学研究就远离了文本,远离了文学,远离了审美。这个方面,我想举一个耶鲁学派的观点。他怎么从文学文本出发?最后又解构了文学自身,就这样,跨学科跨文本无止境的理论扩张。我们举一下耶鲁学派的这个例子。耶鲁学派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德里达,我们知道这个德里达影响很大,引申出来的主要代表。但是其实他在法国影响不是很大,地位不是很高。但是他到美国讲学,在美国受到了很大的欢迎。他在耶鲁大学等等,做了很多的讲演。特别是在耶鲁大学,他受到了当时还是很有名气的四个教授文学批评,他们这些人都是接受新批评的影响。他受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影响,尝试着用解构主义的思想进行文学批评。可以说是法国理论和美国的一个中介的传播者。而且也是比较好的,把法国理论转化为批评的实践。1979年他们出版了一本解构与批评的文集。这个文集里面收录了德里达和这四位批评家,每人一篇长篇文章。这标志着结构主义批评话语霸权在美国确立起来了。这四位学者,后来被人们称为耶鲁四人帮,这是当时中国人去讲他们是四人帮。这里面,我刚才想讲的,他们的解构批评,他们发挥德里达的一些思想,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用语言的修辞性,来解构不同文本不同文体学科的界限。他们走出这一步,实际上就是在西方文论之间把文学的界限逐渐模糊起来了。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德曼。德曼其实是四人帮的老大,就是他最引起注意也最引人注目的观点,对所谓的语言修辞本身突出强调。任何语言中,修辞是语言的一种本性。任何时候不管是口头语还是书面语,语言本身就是修辞性的。修辞也是语言的本质。他里面比如他有一本书《阅读的寓言》,伊索寓言的寓言,它里面的文学和非文学的一些经典文本的解读和阐释认为所有文本用的都是比喻的语言。不光是文学文本,以及所有的语言文本,哪怕是理论的文本,本质上它用的语言都是修辞的都是隐喻的。并不是像我们一样有符号支撑有意义的,有明确的意义和界定。这样就把文学与语言的修辞性,刻画得很好。修辞性成了语言也成了文学的一种本质。他有一段话,我觉得讲的比较武断。他说我毫不迟疑地将语言的修辞的比喻的潜在性视为文学本身。修辞的潜在性,比喻性就是修辞本身。

尽管这有点和普通的习惯相去甚远。他说我能举出许多文学与修辞手段等价的例子,批评的用语都是理性思考的,归纳,理论的话语,他认为也是修辞的。他说文学和批评,他们之间的区别是骗人的。没区别,说区别不一样就是骗人的。被宣告或者被特权说是永远最精确的语言,其结果也是最不可靠的语言。人类真是按照这种最不可靠的语言,来称呼和改变自己。所以他这里面实际上消解了文学和批评两种不同文体的界限,被消解掉了。也消解了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的界限。这个是很典型的。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他把这个理论,自己进行实践,这个修辞性的解构性的阅读。他寻找了一些哲学,政治,法律的文本来揭示它语言上同样有修饰性,而且造成了他内在的矛盾性、虚构性、欺骗性,以造成自我解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卢梭大家都知道。他也写理论的东西,也写小说,他里面用了两个文本,一个是《信仰自白》这个文本,这个概念应该是很理论的语言,分析里面有隐喻。卢梭《信仰自白》的文本,判断这个概念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是有多样性的,有矛盾性的。因此他提出了《信仰自白》这个理论的文本,又有不可以阅读性,所以它的寓意不可能完全按照大家,能够共同阅读他的明确的寓意。那么他另外一个文本就是卢梭《新爱罗伊斯》这个文本里面被称为爱情这样一个概念。他认为这个文本同样有修辞性的,那么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一样,他讲,没有本质区别。他说,通过阅读《信仰自白》的不可以阅读性,《信仰自白》的结构同《新爱罗伊斯》一样,隐喻模式在《新爱罗伊斯》中被称为爱情,在《信仰自白》书中,被称为判断。这两者在都是一个隐喻的模式,这种隐喻模式的解构导致这个隐喻模式被历史的文本系统所取代。所以从以修辞模式为基础的作品类型理论观点看,两个文本之间不可能有区别。不可能有区别就可以画等号了,没有区别。理论文本和文学文本,大家都因为语言的修辞本性,而导致了他们的界限模糊甚至消解了。从语言修辞现象,彻底消解了小说语言和推论语言,文学和一些非文学的文本,乃至文类的界限被打断,这就是他的观点所带来的后果。突破了传统的我们对文类文体,理论和非文学类文本的一些界限。再举个例子就是,另外一个人米勒。他到中国很多次,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在,两千年以后,文学终结论,这个观点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这个人,他有很多观点和德曼不一样。但是他也在这批评语言的修辞性这点,他基本上也是接受的。他讲到一个对文本的观点,他是这样讲的。他把语言的比喻性或者修辞性,看成是语言与生俱来的本性,这点是关键,所以认为,批评只能是解构。解构主义和比喻语言一脉相承。一切语言都是比喻的,这是基本的,不可改变的。一切好的阅读都是要解读比喻,同时也要分析句法和语法。文本的修辞性,必然要导致文本的自我解构,这样的一个文本观念。他说,虽然各种形而上的假设存在于文本本身之中,但同时又为文本本身暗中破坏,就是在自我解构。他们被文本所玩弄的比喻游戏所破坏,使文本不再能够被视为围绕罗克斯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因为我们传统文学观念,罗克斯是一个中心吧。围绕这个中心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那么他认为,比喻游戏暗示我们必须停止为内心的疑虑,或者畏惧,而去寻找某个完全合理的意义。这种疑虑,导致意义的摇摆不定。辩证的两极虽能中和,但也有可能瓦解成互相冲突的成分。这样子来看,从文本是修辞性的,文学阅读和作品,带来的结果只能是解构的。他主要是在揭示诗歌文本语言背后,意义的暧昧不明,模糊不定,或者自相矛盾,从而来证明,语言的修辞性导致批评中的阐释,一定是无穷无尽的。这样就粉碎了,把语言视为人透明的,传达意义的一种幻觉。因为我们一般

都把语言特定指什么都很清楚,能传达意义很明确,把这种幻觉粉碎了。就是像霍普金斯这样的诗人,在他的诗歌语言里也是分隔的媒介,而非调节结合的媒介。语言在这里面都是分隔的媒介。所有的事物汇集于语言中。他对于诗歌的文本,也是用解构,修辞性出发,加以解构。最著名的就是,修辞性阅读,总结了很多解构的方法。就不一一去说。最有名的是他提出了一个解构方法是抓住了一个方法,重复这个概念。英国几名著名作家的七部小说进行了精彩的解构。他的解构策略就是从小说中的种种重复现象。从重复入手,进行细致入微的,多样化的读解。揭示作品中的各种重复现象及其复杂活动方式的背后,非常丰富复杂,变幻莫测,而且甚至里面是互相矛盾的意义。你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符合小说的?都没办法确定,那么这样就将文本分解成碎片。那么这样从重复来解构文本,他自己也有这样简要的概括,解构批评,就像是把一个统一的东西,重新拆分,分成碎片,或部分的过程。就好像一个小孩,将他父亲的手表,拆成一堆,无法照原样装配起来。这是很生动的描绘了解构批评。这个出发点,基础还是语言的修辞性。总的来讲,解构批评学派他们把修辞性看成是语言的本质特性。由这一出发,来消解了文学文本和一些非文学文本,包括理论文本,文本的界限,甚至学科的界限。就会让以后文学研究无限的越界,跨越学科最后变成了文学研究和批评自身缺席的泛文化理论。这种泛文化理论本身导致最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自身缺席了。这是我想举的一个例子,一个方面的案例,另外一个我想,文化研究当中来讲。大家知道,文化研究开始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他是一个文学批评发展起来,延伸到欧美。最后到八七年的以后,他跟后现代,主义思潮,交汇在一起一直扩展的,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哲学法学,与文学传播学,政治经济学,音乐学,美学,艺术学,教育学,甚至工商管理学,也被席卷进去。人文社科,各个领域它都占领。他的研究课题,也是从全球化到本土化,从全英话语到文化话语权,从文学重读到文化帝国主义,从工人阶级到大众文化,从身份认同到性别种族的认同,从女权主义到同性恋,从时尚的追星族到互联网,从新媒体体到实验室文化,真的是无所不包。这样的文化研究之后就成,就是我现在所讲的,他成了多学科,跨学科的面面俱到,大而无当的,超级巨无霸学科。文化研究里面中心磁带都知道,文化这个概念,被无限的扩张。已经突破了艺术审美,人文层次也突破了,而转向了政治,这个很有意思,非常强调政治这个概念,在政治后面也讲到,和我们的理解也不太一样。所以,有一个文化研究代表,重要的人物菲斯科讲,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词,这种的既不是审美,也不是人文的,明显的不是,而是政治的反映。引文我就不全部读了。就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对传统的文化的理解,很不一样。它的范围大为扩展,它不但是在理论研究领域,进入了生活实践中,刚刚菲斯科还讲文化不是人类精神的审美产品,用来抵挡如潮汹涌的工业物质主义的粗鄙污秽,而是工业社会内部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包括了此种社会经验的所有意义。所以原来我们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审美的东西,人文的东西。而这种文化不是,它成为了工业社会内部的生活方式,这样来讲,那么就进入了实践领域,生活实践领域,这我以后再讲。文化研究主要借助文本和话语,这话语,注意一下,文化实践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构成中的运作方式,那他就很厉害了,它还能抗争和改造现有权力结构。一般都认为文化研究有四大理论支柱。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女权主义,一个是解构主义符号学,还有一个是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还包括,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这是四个方面,我不展开了。文化研究,当然它

是有一个逐步的,从西方文化理论角度,有一个过程。文化研究开始是从文学开始,文学批评开始,但是,即使这个阶段不局限于文学批评。战后各种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这种研究聚焦于通俗文化,或者尤其是以政治形势出现的人民文化。一开始文学批评已经有所扩大,范围有所扩大。第二阶段,六十年代开始,伯明翰学派继续引领着,潮流。逐步脱离了文学批评这个狭隘的一块领地,发展一种关于分析翻译批评文化,批判性方法,开始把注意点集中在文化语境中的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一些意识形态,及其相互作用上。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的关键词。这一阶段是一个大的,凝结队伍也在扩大。地域上也扩大到欧美各个国家。第三阶段就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合流的时期,文化研究已经出现了一种转变。转向了一种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后现代文体,在这个阶段英国和北美的文化研究,从以前,社会主义和革命转向了身份政治的后现代文体。而且对媒体和消费文化持更少的批评态度。也就是对媒体和消费文化,而且合流了。就是这样一个阶段。这样一个无限度的扩展和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合流的和媒体的,也就是文化研究转入到这样一个开始。勾勒一下这个发展的过程,我们或许可以,简单的归纳一下,它的特点,第一个,文化研究已经远离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这是我这个题目已经讲到的。把触角伸到所有的人文社科领域,就是成为一门无所不包的超大学科。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他说“文化研究对于女权主义,黑人政治,同性恋运动,美籍墨西哥裔,文化研究对技术发展的后殖民主义研究,以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的,比较传统的追随者,还有,各种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大多,来自外国,通通表示欢迎。”多学科跨学科。这一点,这是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之一,里面我觉得有很明显的,结构主义的理想。刚才我讲的,他们通过语言的修饰性来取消学科界限,取消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这些也就是实际上文化研究的主要功能。他两者有内在的关联,这是第一点。我归纳它们几点,第二点就是,文化研究标志着传统精英和经典文化逐渐被边缘化,而大众文化会成为文化研究的主流。但是有一些美国学者,例如伊戈尔,他把文化研究等同于大众文化研究。他说“文化研究,是人们为了使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迷恋合法化,而常常使用的技术术语”文化研究给予他们一定的学术权威,看似避免了更为激进的术语,如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适当的干预方案,也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方面总妥协。伊戈尔他说“文化理论的另一个历史性进展,就是确立大众文化亟待研究”那么相反,经典的文学,精英的文化,逐渐淡出文化研究的视野,甚至被大学的文学教育所驱逐,这是一会儿还会讲到的。三点,文化研究,虽然就范围来讲越来越广了。学科领地越来越宽,但它最后聚焦点缩小了,聚焦点凝聚在什么?政治和政治学,这个很奇怪,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作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的将它视为某种新型学科的规划。最好是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但这种政治实际上已经变味了。刚才讲的英国人伊戈尔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理论所关注的政治,已经堕落为色情与性欲的政治。他说在某些文化圈的确立,手淫的政治,远远要比中东政治,来得更令人着迷。有人挖空心思的研究乳胶文学和在肚脐上的装饰。他还讲,有的人公然认为,文化理论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之一,就是性别和性欲,不仅是个具有紧迫政治意义的话题,也是研究的合法对象。这样一来,文化研究,所聚焦的所谓政治,也泛化异化了,成为对资本主义现世无关痛痒的装饰品。本来支柱之一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在文化批评中,也变质了,这就不是真正的批判。这三点既是文化研究的走到九十年代以后的特点。这三件,不仅是文化研究本身的产品,特征,它本身也是导致文化,研究,衰落的原因。里面非常值得反思的一点,在我看来就是他们的文化研究发展到这个地步,也就是我们今天集中反思的一点就是它对文学。文化研究从文学起步但是越来越源于文明,越来越源于文学的文本,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呢。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甚至对立。专门的文学研究实际上会重复的挤压,不但挤压甚至走向边缘,变成文化理论的一种工具和附庸。所以这样的情况不是我们开始所能料想到的,也不是很多搞文化研究理论出身的人原来所期望的。这也是文学理论辩证以后,魔幻理论对自身的极端膨胀以后会走向危机,走向破灭这个征兆也出来了。乔纳森·卡勒有两段话,他话说的比较早的,另一段话是比较新的。这两段话一个是看出他的变化,另一个是他抓住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他说在82年就《论解构》这本书,里面他已经讲了,有证据显示,文学理论应另作别论,为什么呢,他说文学理论的著作,且不论对阐释有着各种影响,都在一个未经命名,然而经常被简称为理论的领域之内,密切联系着的其他文字。文学理论已经和其他领域发生密切关系,这个领域不是文学领域,因为其中许多最引人入胜的著作并不直接讨论文学,那个时候82年已经是那样了,他也不是对时上意义上的哲学,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因为它包含了黑格尔,也包括了马克思。它或可成为文本理论,文本意义被理解为语言拼成的一切事物的话,那么这就是文本意义。但最方便的做法,还不如直呼其为理论。这个术语引出的那些文字,并不意在支持改进与产生,它们是大杂烩。那么这句话中已经告诉我们文学理论已经变成大杂烩了,不是专门的文学,不是哲学,什么都包在里面。所以后来伊戈尔的理论结构,理论把这些东西都囊括进去,这是82年在文化理论,文化研究还没有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它已经发现文学研究被淡化掉了。到2011年这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和我们很接近的时间。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这个所谓理论,他说“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说法”,他认为这个理论就是很奇怪的。他82年已经有这个理论,这所谓理论的重大冲击之下,美国和西欧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和转型,这是我觉得很到位的事情。他说“如果有人问是关于什么的理论”,因为你讲理论的,是关于理论的嘛,“答案常常是含混不清的,那些常常被看作理论的东西,就学科而言是极少数文学理论的”就学科来说它早就划在其他学科里,极少数文学作品。例如它和不探讨文学作品的区别性特征及其方法论原则。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米歇尔福科,以及很多其他理论家的理论著作,都根本不是在研究文学,最多不过是稍微牵扯到一点文学而已,这说的大白话,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在欧美是非常流行。卡勒应该说现在还是健在的,而且是美国非常有影响的批评家,今生经历了也参与了文学理论向文化理论的扩张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看到了文学理论自身边缘化的结果,所以我相信他感受很真切。这个情况证明了我刚才讲的文化研究的扩张并非毫无合理性,它有它的合理性以及在当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到最终把文学理论边缘化甚至冷落下来,这个本身说明细胞伪论陷入了一个困境。那么,文化研究在我看来比耶鲁学派走的更远,而且他的消极负面的东西也更多。最主要是两点,一点是文学缺位,文学理论批评只有文化,没有文学本身,存在不着边际的泛文化,泛政治化的批评。第二,由文学批评起步的文化理论由于远离了文学和文本,远离了文学实践,文学现实和批评

甚至也远离了真正的文学批评,那么它就会成为什么呢。成为理论自言自语,自娱自乐的荒唐可笑的情况。我就是偏离理论,与现实的文学创作,文学实践,文学文本,批评也不在其考虑范围,这种情况也就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提出强制反对。

从理论出发,文学作品成为它先入为主的理论,借助他强加在作品和文本上,而对于文本本身审美的文学性的东西视而不见,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两点从耶鲁学派,把文学语言的文学性,文学的文本作为必须面对的第一手。这样的理论到一定的时候它不能够衰落下去。那么我想给大家再介绍一遍,这个情况不仅仅在学术上,理论上,而且在美国的大学教育,在欧洲还有出现,甚至在德国,但是在美国它走的很远,这个里面它进入了大学教育,它在文学教育方面,这种理论造成的影响我觉得有些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在大学机制内,这种文化研究的扩张适应范围改变了大学的文学教育机制,这个带来的对一代人有很大的影响。同时是耶鲁学派的,代表人哈洛德·布罗姆,他原来当然也是接受了德里达一些理论,他在文学批评中也做了很有创作性的工作,我翻译过他一本书,叫《误读图示》,就是误读的地图,《A Map Of Misreading》。这个书就不讲了,他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派研究里面,包括修辞,还有其他的。所以一开始他有这个理想,但是他后来还是。它有一个特点,它基本的立场没有变,对经典的维护,所以对文学它的审美特性的维护,这个不一样的。他这个大家可能都看到过,中国有一本书,90年代前期写的,《西方正典》,这本书在国内影响很大。这在西方也有影响,在美国遭遇不是最好,也是起到很强大作用的,这老头还是坚持了的。它对90年代初期,恰恰是文化研究发展到顶峰的阶段,那么他就自觉的对抗文化研究,为文学研究来辩护,文化研究把他文学作品都排斥掉了。所以为什么要辩护,为文化研究在美国流行和影响到大学的教育,所以他痛心疾首。他说,虽然那些所谓的文化战争与我无涉,但是它造成了严重的学术刻薄,如今学界是万物破碎,只有杂乱无章,在持续的蔓延。他对这个是非常的不满,他说当前的低劣状况,今日的学界已经变得走火入魔了,这说的非常尖锐。他对文化研究带来的灾难,非常义愤填膺。他对文化侵占了美国大学的教育体制,他说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经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文学批评已被文化批评和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很多法国的后结构后现代的理论家。这种时髦东西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所以文化研究,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些大学里的教育政治化,有他的理论的观点。他说审美价值常常被视为康德的一个观念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他认为是一种存在,在很多经典里面。他几十年的文学教育和批评的生涯,他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和批评,就是建立在康德的审美经验和审美体验的现实基础上的,而不是所谓的观念。他有这么几个特点,使文学研究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哲学基础,文学要摆脱这个束缚,或者独立的自由。他嘲笑那种文化研究,喋喋不休认为最好把文学体制解释成资产阶级体制所促生的神秘化,就是要把审美降低为意识形态,或者形而上学,这个是一点。

第二点是反对抹杀文学审美价值,因为他认为文学就一定要坚持审美的自主性的底线,这个底线不能破。文化研究把他那样的人看作怪人,他极度的不满。他认为恰恰这些人标志着文学研究的堕落。区分了文学与大文化,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明确界限,否定文化研

究对文学研究的无止境的蚕食。

第三点,坚守文学独立的文体和独立学科的立场。反对前面讲的消极学科界限文体界限,反对用涉及林林总总,非文学的主义和学科领域的所谓的文化批评来替代真正的批评,进一步捍卫了文学研究自身的疆域。

第四点,主张要重新恢复对文化研究极度边缘化的西方传统和经典的崇高地位。他从数百个往期工人的西方经典作家中遴选出 26 位代表人物,对他们的经典作品充满激情。他给予这个审美的评价,来维护经典的地位。他认为,维护还是反对维护经典,是区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试金石。对于抹杀经典的这些人,为了实现他们并不存在的社会变革而颠覆现存的经典,甚至不惜,摧毁经典。这一点密切相关的,他仍然很清高的坚持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他虽然承认文学批评不会成为民族教育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他认为,文学批评不需要负担这样的任务。但是他肯定,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艺术还是要维护。

第六点,对于美国大学文学教育破坏的问题,他给予非常严重的关注。他说,对西方文学的研究仍然会继续,但是按照目前的趋向来看只会如今日的古典学的规模,今年的英语系,将会更名为文化研究系。在这里,蝙蝠侠漫画,电视电影以及摇滚乐,将会取代莎士比亚以及华莱士史蒂文斯,曾经是精英荟萃的主要大学和学院,还会讲授一些有关弥尔顿以及其他名家的课程,但这只会在由三四位学者组成的系里讲授,这些学者类似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教师。英语系是很大的,里面经典的文学和名家作品都是成为主要的课程,最后缩小到只有三四位学者组成的系里讲授,类似于希腊文和拉丁文。像是希腊文,是小语种,这很少人去学,也很少有许多老师。这种原来的文学系就完全垮掉了,变成这种不是很上心的课程。一是英语系及相关学科始终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并且还极不明智的吞噬下一切看上去可以吸收的东西,而这种生吞活剥产生的结果是自我毁灭,诗歌、戏曲、故事、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与政治讨伐所取代。或者通俗文化作品取代难懂的大家之作,这就是美国文学教育的现状。这就可以看到文化研究不仅仅是对研究领域的扩张,对大学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大学英文系真正的文学研究和教学,无论在课程设置的规模上,讲授的专业内容上,还是教材的选择使用上,师资队伍上,都被挤压萎缩到无足轻重的边缘地位。那么《西方正典》这本书里,对这种现象批得很厉害。我觉得这一点把批判的触角伸到大学教育体制的层面,这一点是相当深刻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他这种感受,在那个时代那个时期,还是很孤独的。他自己也说的,自己作为全世界哗众取宠的教授,各种有关性倾向和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以及无休止的文化多元主义。我于是明白了,文学研究的巴尔干化已经是不可逆转了。他感到自己已经没办法挽回现状。这个在美国特别严重,因为文化研究一下子扩展下来,在那个情况三势不可挡,不是几个人几个教授所能阻挡的住的。但是后来像菲利浦米勒这样的耶鲁学派的,他比较复杂。他一方面对文化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他自己还保留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读到过他的一些文章,我最近在写一篇东西,讲他的文学终结论的。其实中国学者对他有很多误读,这里面他谈到我有生之年文学还会继续做下去。当然,一方面,他看到时代造成的文化研究的扩展的必然趋势,这我就不讲了。他认可德里达对当今社会转型,文化移位的看法。他说,近年德里达在一个研讨班上,中肯地指出新的电子空间、电视、电影、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互联网从根本上深切的,改变了自我价值,以及民

族国家的政治学。那么在这样一个电子化的政治时代。新媒体的时代改变了人文学者之间,和他工作的联系方式,经济和文化体系,全球化导致国家力量相对弱化,也对大学的功能产生影响。使大学,人文学科,懂得去教育,发生转型。以强调传统文学经典有永恒价值的观点,日益被文化多元主义理念所取代。当然,美国大学和我们情况不一样,他也讲究原来的文学系的教育经费越来越缩减,传统文学系逐步的自我解构,走向文化研究。教师们花在文化理论的实间比教授经典作品的时间要多得多。所以原来的经典,传统经典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架构,就被无可奈何地抛弃了。这客观的从大时代去论证,他认为也是合理的。但是他看到内部也有内在的,他分析了米勒的新一代的文学老师和研究者队伍。以及美国大学里,教师队伍发生很大变化,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年轻化,这一点他也看得很清楚。他们是被电视和商业化流行音乐熏陶长大的第一代。这一代人,他们当中许多人从小花在看电视和听流行音乐的时间人比读经典的时间多。意思是,新一代的批评家,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新型的,消费主义的视觉和听觉文化所塑造起来的。他们当然,更愿意研究大众文化,所以他们转向文化研究,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种理论这样分析,两个方面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所以美国为什么阻挡不住,因为他确实是这么个过程。现在西方也在反思,因为文化研究确实已经在衰落了。现在进一步搞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捍卫经典的老一代的人不多了。有的离开了工作岗位,所以也很纠结。这两天也写过文论说他们西方。新的一些走向,其中有一个就是,回归审美,但这个回归,跟我们今天的理解的回归也不一样。那这个趋势,有一点想要回归文本,还算是一个新的动向,不成气候。所以我觉得对我们中国学者来讲,中国搞文艺的来讲,从西方走过来这段道路我们也要适当的,重视这样一种现状,也要进行一些反思,避免走他们的老路。我自己这几年完成的一部书,叫《后现代文学理论主义市场论稿》,这书后来被纳入了国家社科文库,今年出版。有的文章都已经发表了,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其实也有密切关系。哪些方面对中国当代文论产生积极影响的。总体上,主要方面还是肯定的,也有批评,也要反思和批评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种比较清醒的态度。我们很多人都收到过,西方文学理论,文艺理论的影响。有很多进入了我们的思维。甚至还包括上次,搞古代文论的老师他们有些用的很多方法和术语也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所以这主要的方面基本方面还是应该加以肯定,当然我们还是接受有批判有选择,有分析的。批判的,加以借鉴吧。

(录音整理:陈佳利)